◇开局起步“十五五”

加强党的领导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张进财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体制机制，明确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发挥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推动、组织实施，并提出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这一制度安排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整体协调提供了新的组织支撑。落实党的领导，需要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贯通决策部署、工作执行和监督评价的治理能力，推动不同类型文化遗产实现系统性保护、整体性传承。

从分工管理走向统筹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制度要求

文化遗产往往同时具有历史、社会和空间属性。一处传统村落，既包含古建筑和街巷肌理，也承载民俗活动、传统技艺和居民生活；一条文化线路，则可能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涉及文物保护、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旅游管理等不同职责。部门分工有利于发挥专业优势，但面对涉及多个对象和领域的保护事项，还需要明确谁来牵头、如何协商、发生分歧时怎样协调。如果只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完成任务，文化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物质遗存与活态文化之间就容易缺少整体安排。

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职责在《规划》中得到明确，其意义在于为跨领域重大事项提供组织统筹的制度依据，形成决策协调与工作执行相衔接的安排。党的领导由此体现为统筹重大目标、重点任务和责任关系，并把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贯穿有关决策。与此同时，专业部门仍须依法履行职责。文物修缮需要遵循专业规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非遗保护则应尊重传承主体的特点。统筹协调应充分考虑不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律，使不同的专业管理在共同目标下形成合力。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还要求分类保护和共同治理相结合。不可移动文物重在本体安全与历史环境维护，非遗重在传承实践和文化生态延续，古籍、档案等则需要长期保存与研究利用。保护对象各有特点，统一统筹并不意味着采用相同管理方法。宜在重大规划、跨区域保护和公共资源配置等事项上明确共同目标，同时支持主管部门依照专业标准制定分类措施。文化遗产兼有建筑、技艺和生活等要素时，应使不同保护方案相互衔接。

这一制度创新也对地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结合遗产资源禀赋确定保护重点，将国家规划要求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相衔接。中央层面的统筹部署应与地方保护责任形成有效对应，明确不同层级承担的工作任务，使保护目标能够传导到具体领域和属地，兼顾统一要求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条件。

从组织统筹走向责任落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进路

推进重大保护事项协调，把组织统筹转化为具体工作程序。应依据国家规划确定本地区的保护重点，对跨部门、跨区域事项建立议题提出、联合研判和任务分办机制。在规划论证和项目审批前期充分识别风险，把保护前置要求落实到相关环节。对于线性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等整体保护对象，可围绕共同保护目标明确牵头单位、专业部门和属地政府的任务，使跨区域事项有人协调、跨领域问题有人负责。

推动保护责任向基层落实，建立群众和专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关系。传统村落保护涉及居民居住需求与历史风貌维护，非遗传承依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社区的持续参与。可依托基层议事协商平台，听取居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专业人员的意见，将保护方案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结合起来。对修缮维护、日常巡查、传统技艺传习等事项，应建立可持续的参与渠道和支持安排。专业性较强的事项则应发挥文博机构、研究机构和专业队伍的作用，使组织统筹与专业判断相互支撑。

推动保护与活态传承衔接，重视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使用。把保护本体、研究阐释和公共文化服务统筹起来，促使博物馆、学校、文化馆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经常性合作。对具备开放条件的文化遗产资源，可在不损害历史真实性和文化完整性的前提下开展展示教育、研学实践和传统技艺传习；对仍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应尊重原有生活秩序，支持居民参与适度利用和日常维护。还应协调文旅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关系，防止把合理利用简单等同于商业经营，避免短期项目挤压长期传承空间。

推动保护资源合理配置，要发挥党委统筹保护任务和投入安排的作用。不同地区遗产类型、财政条件和专业力量存在差异，应结合重大保护事项，协调文物、文旅、住建等部门的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优先保障濒危遗产与保护任务较重地区的实际需要。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项目，应明确投入责任和后续维护主体，避免建设完成后管理脱节。人才培训、技术支持和传承人扶持具有长期性，还需统筹年度任务与持续投入，使组织协调形成可落实的资源保障。

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把文化遗产保护信息衔接到风险预防工作中。各部门掌握的文化遗产名录、空间规划、建设项目和安全监测信息各有侧重，重大事项研判需要建立必要的数据衔接渠道。可协调明确数据共享范围、更新责任和问题交办流程，将文化遗产调查成果与建设管理、日常巡查中的风险线索相互核对。在保护风险显现时，及时组织专业人员研判并启动相应处置程序。信息共享还须遵守文物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

推动保护责任持续落实，强化党领导下的督察评估和执行反馈。《规划》明确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并安排在2028年年底和2030年年底分别开展中期评估、总结评估。地方层面可结合年度目标，对保护措施落实、文化遗产安全、资金使用及公众参与等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发现职责交叉或保护措施难以实施时，应及时组织会商、调整工作方案。督察评估既要关注任务完成情况，也要关注文化遗产本体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历史环境是否保持完整、活态传承能否持续，使责任落实具有可检验的实际内容。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黔东南州榕江县古榕社区群众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歌。

周光胜　摄（影像贵州）

◇大家理论

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

聂钰霏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政府投资基金是作为财政资金安排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政府投资管理的有效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务必进一步站稳立场、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将财政资金转化为“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及中小企业发展。

把牢政治方向，做到“基金为公”明定位。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全过程各方面，要求“找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政府投资基金“姓公不姓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旗帜鲜明讲政治，对标对表抓落实，为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根基。具体实践中，要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更加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坚持政府投资基金跟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走，紧扣我省主战略、主定位，聚焦升级产业、培育企业，坚持发展所需就是基金投资所向。

校准战略投向，做到“基金为业”促发展。政府投资基金聚焦产业、创业、企业，其投向具备较强牵引性、撬动性，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工作办法（试行）》，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印发了《政府投资基金投向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对政府基金投向、布局和评价进行了全面规范，明确了五大重点投向领域和六类禁止投资行为，为科学规范做好政府基金投资管理拧上了“紧箍咒”、划出了“硬杠杠”。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中要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必须按规律办事、依科学决策，统筹处理好全局与一域、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系，稳慎做好布局规划和投向管理。具体实践中，要发挥好基金企业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紧扣我省主战略、主定位和“富矿精开”“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等战略任务精准滴灌、靶向赋能，加强风险研判，优化集体决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基金支撑。

锚定实绩导向，做到“基金为民”见真章。政府投资基金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促发展、惠民生，只有坚守为民初心、实绩导向，才能筑牢立身之本。在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中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必须坚持为民造福、聚力民生福祉，做到重实绩、重实干、重实效。一方面，要充分保障出资人权益。结合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实际，注意在收益分配、损失分担等方面公平维护各方出资人利益，保护社会资本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基金管理人积极性。要营造鼓励探索、尊重专业、崇尚担当的干事创业氛围，实现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的有机统一。要充分发挥基金行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典型引领和警示教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和情怀，为促发展、惠民生做铺垫、打基础。

（作者单位：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激活地域文化生命力

王胜军　蔡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沙滩文化作为贵州清代儒学乡土化成果，完整展现了中原儒学从植入、融合、改造到内生传承的整个过程。厘清贵州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激活地域文化生命力，是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文化根基的重要举措。

从外植到内生：儒学扎根乡土。沙滩文化孕育和成长于黔北沙滩一带的乡村聚落。沙滩左近有禹门寺、石头山、琴洲、栀冈、桂冈、锁江桥等八景，山水秀绝。由明入清，历经数朝，逐步形成了黎、郑、莫三大家族，彼此结成姻娅，互为师友，累代耕读，诗礼传家，将传统儒学渗透到黔北腹地乡村。沙滩文化将儒学传播场域下沉至乡村宗族，极大地拓展了儒学在贵州传播的广度，深化了其扎根乡土的深度。长久以来，贵州儒学传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外来学者入黔讲学如王阳明、邹元标等；二是依托城市的学宫与书院开展知识传授。二者虽深刻影响了贵州文化教育发展，但本质上属于中原文化移植，而沙滩文化则彰显出贵州乡土社会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主动认同与自觉承接。沙滩文化扎根乡土宗族建构起赓续传统、珍视文化、不耻相师的生活模式，相较于外来的讲学，具有本土自发性的特点和优势。

从积累到创造：学术实践开拓。长期以来，贵州相较于中原和沿海，文献积累与学术传统相对薄弱。沙滩学者将清代主流学术的考据学（又称汉学、朴学）引入贵州，显著改善了贵州文教的知识结构，推动了本地学术与全国文化发展的接轨。沙滩学者将知识积累视作学术实践的重要途径，通过图书积聚，重塑了黔北乡村的知识根基。许多沙滩学者毕生潜心治学，致力于学术开新，还特别注重与乡村社会生活相关的农桑、水利、医药之学以及地方志乘编纂，展示了当时黔北乡村文化的水平和活力。沙滩学者依托典籍收藏、研读与训释，完成知识的积累与转化，也使阅读与著述成为乡村士人的日常生活。

从精英到大众：礼仪与伦理的落实。南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被正式确定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此后，也被确立为元、明、清的官方思想，是主流的学术领域。考据学崇尚专精知识，向来作为精英之学而存在。沙滩学者尊经考礼、躬行实践，将官方哲学、主流学术合并为一，落实到乡村实际生活秩序之中。沙滩学者以“整齐严肃”“敬义夹持”的修身功夫，规范日常起居与礼仪实践。正是此种长期修养，塑造了沙滩学者的情怀、意志和气象。沙滩学者将个人修身进一步扩致到孝悌持家。黎安理与其女黎三姑分别以“孝义”“列女”入《清史稿》，成为传统伦理的人物典范。沙滩文化主要依托修身、齐家辐射乡里，乡村秩序就在这样自发、自动的过程中悄然达成。

从书本到民生：以实用知识惠乡济世。乡村中的儒家学者长期参与农事，往往成为农业和各种生活技能经验的总结者，沙滩学者即为典型。他们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落实到以各种实用知识惠乡济世的具体实践中。沙滩学者耕读传家，特别注重农业经验总结与推广。黎家非常强调亲自参与劳动的意义，黎恂撰写有《农谈》一书，其子黎兆普则精通果物栽培，乡农长期引以为法，多获丰收。沙滩学者还精研医术，以之救死扶伤。比如，郑仲侨每当求诊者上门，风雨夜深无阻，临终时将巨额借券付之一炬。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沙滩学者更是心系民生、文化和家国。郑珍到古州任训导、到荔波任教谕，推动了偏远地区的文教；莫友芝之弟莫祥芝性格刚毅，清廉自守，为官不畏强暴，肃贪惩恶，为民兴利除弊；黎庶昌在满朝齐喑之时，以廪贡生的身份上万言书痛陈时弊，建言改革，为国尽责。

文化唯有植根乡土，才可以生根发芽，沉淀为地域传统最深厚、最稳固的内在根基。沙滩文化的历史轨迹，系统地展示了贵州乡村儒学从外植到内生、从积累到创造、从精英到大众、从书本到民生的发展规律。沙滩文化沉淀下来的学术精神、人物故事、文物遗存，亟待更为深入地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和合理活化利用，以便为新时代贵州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为丰富的本土原生经验支撑。

（作者单位分别为：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2AZX010〕阶段性成果）

以“村字号”IP繁荣新大众文艺

王寒　张琳

2026年4月，贵州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2026—2028年）》，率先在全国出台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制度化文件。近年来，贵州借助“村超”“村BA”“村T”等“村字号”IP，依托省内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群众高昂的热情等优势，坚持党委领导、人民主创、科技赋能、矩阵传播“四位一体”共同发力，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

坚持党管文艺原则，规范行业有序发展。繁荣以“村字号”IP衍生的新大众文艺，要不断推进“文艺两新”的党组织建设，将党的领导贯穿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产和传播全过程，积极引导群众将生活“唱出来、跳出来、画出来、写出来、演出来”。重点发挥省级行业协会和联谊会的监督作用，用好地方文艺组织的重要辅助功能，推动行业数字化、法治化、规范化发展。联合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党校等机关单位，加强文艺工作者的培训工作，切实把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激活全民创造活力。“村超”“村BA”“村T”等“村字号”系列活动发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村超”已然成为各族群众展现文艺生活的舞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盎然生机与人民群众的强大创作活力。“村T”既展示华丽的民族服饰，也展现朴素的日常生活，T台成为各族群众文艺创作的孵化基地和重要源头。这些“村字号”舞台吸引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爱好者前来参与，既展示了我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创作立场，以及各族群众强大的创作热情，也为广大普通爱好者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舞台。推动“村字号”IP繁荣新大众文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普通创作者提供向上展现的渠道和空间，尊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作品创作，出台相关法规保障作品版权；拓宽“村字号”文艺作品评选范围，常态化举办“村字号”文艺创作论坛和展览，让人民生活成为创作“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坚持科技赋能，提升作品创新性与亲切感。贵州“村字号”系列活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贵州是全国智算资源富集地区之一，为“村字号”数字文艺转化提供了极大便捷，已具备以“村字号”IP繁荣新大众文艺的现实基础。以“村字号”IP繁荣新大众文艺，要坚持科技赋能，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场景，利用AI技术帮助人物塑造、台词撰写、动作矫正与声部修复等工作，增强文艺作品的科技感与亲切感。增加人工智能科普“双百行动”培训次数，降低培训准入门槛，打造创作驿站、共享工作室等新大众文艺空间，让普通村民、乡土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工作者都能够低成本、多渠道、高效率参与文艺创作。拓宽“村字号”IP文艺创作边界，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与科学技术，探索更多“AI+”创作路径，形成“群众灵感、AI赋能、本土特色”的全新创作模式。

坚持矩阵传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作品影响力。贵州“村超”“村BA”“村T”等“村字号”系列活动的出圈，得益于借助抖音、快手、火山视频、微视频等网络传播平台，构建起“多主体、多渠道、多内容”的全球传播矩阵。以“村字号”IP繁荣新大众文艺，要坚持矩阵传播方式，支持不同领域人群以“村字号”IP创作、剪辑、转发评论文艺作品，对高质量作品给予线上推流，推动形成“官方发布、群众转发、线上引流”的全域传播格局。推动“村字号”文艺作品海外传播，集中展现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和群众日常生活，传播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场景。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版责编：陈翔　张莹　杨春凌　周章龙　版式设计：侯刚